

#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贾俊雪 郭庆旺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作出科学判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显著性较差,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则较为模糊。这些影响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阈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总体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词:**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安排 政府间财政收入责任安排 地区经济增长

##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一直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因及其可持续性,甚至开始探讨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形成“中国模式”。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也试图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但本文仅选择一个侧面,即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与地区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本文之所以讨论这一问题,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30年前,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伊始,财税体制改革旨在解决“政企关系”——政府与(国营)企业间的责、权、利问题,而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核心是解决“政府间关系”——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责、权、利问题。前者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剩下的问题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加以解决,而后者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支出责任安排)及其相应的财力保障(收入责任安排)的错位与不对称性矛盾突出。破解这一矛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本文旨在从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视角,审视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科学合理性。

关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学术界还远未形成一致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点的中国财税体制变革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在政府纵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

\* 贾俊雪,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junxuejia@sina.com;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guoqw@ruc.edu.cn。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50002/G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7&ZD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7XNB013)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用,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QianandRoland,1998;Jin,QianandWeingast,2001;LinandLiu,2000;朱恒鹏,2004;张晏、龚六堂,200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的分权化进程、不合理的分权结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我国垂直化的行政管理架构、过分强调GDP的政治晋升机制以及相应制约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中的保护主义色彩和掠夺型策略行为,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ZhangandZou,1998;周业安,2003;周黎安,2004,2007;郭庆旺、贾俊雪,2006;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由此可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变革的经济影响,关键在于能否全面厘清分权化改革带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刻影响,这也正是下一阶段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职能优化,更好更快地发展地区经济。

本文通过全面考察政府间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存在的问题及未来面临的挑战。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于政府间总收支责任安排(或者说财政分权程度),而在现实经济中,我们更为关注各类支出项目(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基本建设等支出)的责任如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安排(或者说优化财政分权结构),以更好地实现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因此,本文在考察政府间总收支责任安排的经济增长效应基础上,特别着重考察不同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的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2)以往研究在分析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时,往往仅就收支责任安排的某一方面单独加以考察,本文则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纳入到一个实证分析框架内,以更好地揭示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3)为了更好地校正可能存在的估算偏差,本文采取逐步推进的做法,首先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解决不同地区间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然后运用动态效应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校正,最后利用阈值效应面板模型考察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二、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历史演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承包制改革,这次改革基本延续了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放权让利的做法,确定了地方政府“剩余占有者”的地位,使额外增长的税收大部分归地方政府支配;二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以扭转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为出发点,具有较明显的财政集权特色。

伴随着财税体制变革,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图1给出了我国29个省份1978年、1985年、1993年和2005年收支责任安排的核密度图。由图1(a)可以看出,1978—1993年间,我国政府间支出责任安排的核密度曲线呈现出不断向右偏移的态势,其中1985—1993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意味着此间我国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事务较多。1994年分税制改革

王永钦等(2007)详细论述了我国分权化改革的得失,以及未来我国分权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统一简称为省。由于数据问题,本文没有考虑西藏,且将重庆加入四川来考虑。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本文用省份人均财政总支出/(省份人均财政总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总支出)来度量支出责任总体安排情况,用省份人均财政总收入/(省份人均财政总收入+人均中央财政总收入)来度量收入责任的总体安排情况,用省份人均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省份人均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人均中央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来度量生产性支出责任安排情况,用省份人均财政科教文卫支出/(省份人均财政科教文卫支出+人均中央财政科教文卫支出)来度量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情况,用省份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省份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均中央行政管理支出)来度量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情况(ZhangandZou,1998;张晏、龚六堂,2005;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以来,这种事权下放的势头明显趋缓,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集权化趋势,体现在2005年核密度曲线较1993年而言,波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左偏移且高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1985年间,我国政府间收入责任安排则呈现出大幅集权化态势,1985年以后这种趋势发生了明显逆转,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中明显居于主导地位,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则重新呈现出集权化趋势且力度很大(见图1(b))。由此可见,除了1985—1993年间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总体上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变化态势外,其余时间都处于明显的不匹配状态,整个样本期内二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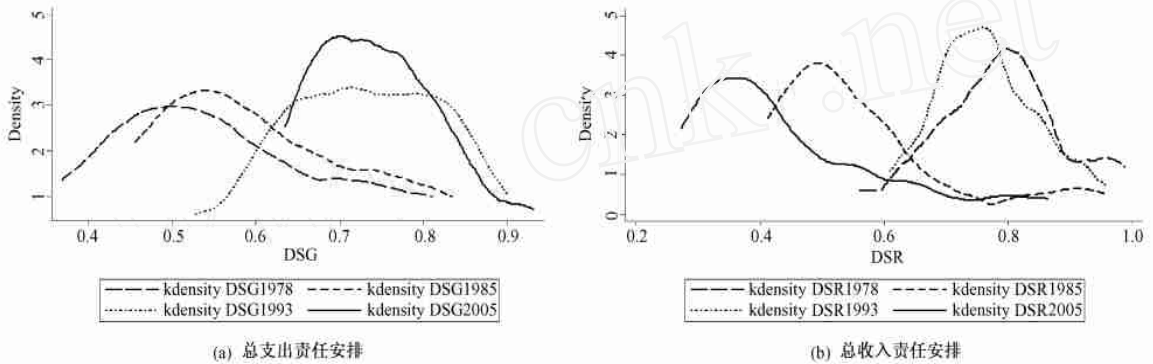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政府间总收支责任安排的核密度图(Epanechnikov核函数)

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我们进一步考察不同支出项目责任安排的变化情况。我们将财政支出划分为三类,即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并分别用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来近似捕捉这三类财政支出的变化态势(郭庆旺、赵志耘,2006;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图2(a)表明,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在1978—1985年间呈现出不断集权化的趋势,此后发生根本性变化,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经济建设事务,其中又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表现得最为突出。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与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的变化趋势总体上较为一致,不同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分权化势头明显趋缓,但地方政府仍承担了90%左右的社会性支出事务(见图2(b))。与上述两种支出责任安排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维持性支出责任一直呈现出明显的集权化态势,1994年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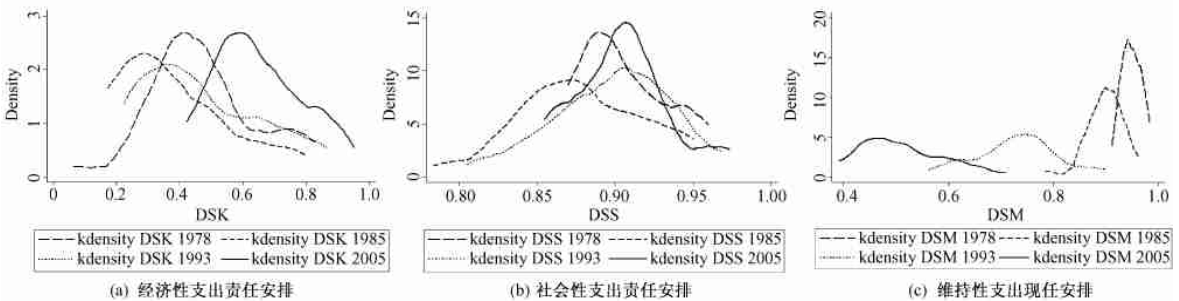


图2 政府间各支出项目责任安排的核密度图(Epanechnikov核函数)

正如表1所概括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时期的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以及不同支出项目的责任安排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特点。紧接着的问题是,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这种态势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本文不仅要澄清这些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试图从中观察出过去的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科学合理,进而提出改革建议。

表 1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态势(1978—2005 年)

责任安排 \ 时期	1978—1985 年	1986—1993 年	1994—2005 年
总支出	分权化	强分权化	弱集权化
其中：经济性支出	集权化	弱分权化	强分权化
社会性支出	集权化	分权化	弱分权化
维持性支出	弱集权化	集权化	强集权化
总收入	强集权化	强分权化	强集权化

### 三、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经济增长效应：固定效应估计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地域辽阔,各省份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差异很大,这些难以准确度量的因素也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校正这种异质性带来的估算偏差,本节首先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估算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一)模型设定

以我国 29 个省份 1978—2005 年间的数 据为基础,我们构建如下形式的 面板数据模型:

$$Gy_{it} = X_{it} + Ds_{it} + DsD94_{it} + DsDE_{it} + \mu_i + \tau_t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Gy_{it}$  为第  $i$  个省份  $t$  期的人均产出实际增长率,  $X_{it}$  为一组控制变量。  $Ds_{it}$  是核心解释变量——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变量,对于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安排变量,我们分别考虑总支出责任安排以及各类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对于政府间财政收入责任安排变量,我们只考虑了收入责任的总体安排。  $DsD94_{it}$  为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时间哑变量,即 1994 年以前为  $Ds_{it}$  乘以 0,1994 年及其后为  $Ds_{it}$  乘以 1,用以捕捉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影响。  $DsDE_{it}$  为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哑变量,即东部省份的  $Ds_{it}$  乘以 1,其余省份的  $Ds_{it}$  乘以 0,用以捕捉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于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不同影响。  $\mu_i$  为个体效应,  $\tau_t$  为时间效应,  $\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对于  $X_{it}$ ,我们主要考虑如下变量:(1)物质资本投资率,即物质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率;(2)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我们利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与劳动力的比值加以度量,同时为了反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采用 5 年的移动平均值(Mankiwetal,1992;de laFuente,2003);(3)劳动力变量,用以捕捉劳动力市场表现,包括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变化以及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我国各省缺乏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数据,我们用各省劳动力数据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近似代替;(4)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产出的 5 年移动平均值的自然对数加以度量,以捕捉可能存在的经济收敛效应(LinandLiu,2000);(5)经济开放度,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率加以度量;(6)财政收入比率,即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率,用以度量省份经济负担。

#### (二)估算结果

在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具体估算模型(1)时,我们分别考虑了包含与不包含政府间收入责任

1978 年以来,我国税制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即 1984 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和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两次改革都涉及到一些税种的撤并和新税种的开征,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收入数据具有很大的不可比性。对于收费收入,一方面由于税费改革的影响,也存在数据不可比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各省缺乏较为完整的数据,而对于其他收入形式如企业收入,目前同样缺乏较为完整数据。有鉴于此,本文没有考察各类收入项目责任安排的影响。

安排变量这两种情况。此外,鉴于样本期时间跨度较大,我们也考虑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问  
题。事实上,总支出责任安排和支出项目责任安排影响方程的LBI统计量(BaltagiandWu,1991)分  
别为1.46和1.55,表明这两个回归方程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序列相关性问题,因此我们进行了AR  
(1)校正。表2给出了各模型的检验和估算结果。

表2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经济影响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总支出责任安排的固定效应模型			支出项目责任安排的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1c (AR(1)校正)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AR(1)校正)
常数项	0.214(0.07) ***	0.34 (0.08) ***	0.023(0.07)	0.076(0.13)	0.097(0.14)	-0.458(0.11) ***
经济发展水平	-0.097(0.05) **	-0.166(0.05) ***	0.049(0.06)	0.028(0.06)	0.028(0.06)	0.244(0.08) ***
物质资本投资率	0.167(0.02) ***	0.154(0.02) ***	0.165(0.03) ***	0.097(0.03) ***	0.096(0.03) ***	0.091(0.03) ***
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0.023(0.07)	-0.011(0.07)	-0.146(0.09)	-0.075(0.07)	-0.079(0.07)	-0.159(0.1) *
劳动力变量	0.101(0.06) *	0.082(0.06)	0.142(0.07) **	0.056(0.06)	0.051 (0.06)	0.075(0.07)
经济开放度	0.043(0.01)	0.058(0.02) ***	0.055(0.02) ***	0.041(0.01) ***	0.045(0.02) ***	0.027(0.02)
财政收入比率	-0.015(0.04)	-0.028(0.05)	-0.256(0.06) ***	-0.126(0.04)	-0.097(0.05) *	-0.315(0.07) ***
收入责任安排	—	-0.019(0.03)	0.024(0.04)	—	-0.04(0.03)	-0.02(0.04)
总支出责任安排	-0.056(0.04)	-0.02(0.05)	-0.168(0.05) ***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	—	—	—	0.096(0.03) ***	0.099(0.03) ***	0.039(0.04)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	—	—	—	-0.148(0.05) ***	-0.136(0.05) ***	-0.068(0.04)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	—	—	—	0.139(0.04) ***	0.134(0.04) ***	0.254(0.05) ***
收入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0.105(0.04) **	-0.076(0.05)	—	-0.013(0.05)	-0.034(0.05)
总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0.009(0.01)	0.082(0.03) **	0.028(0.04)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	—	-0.042(0.02) *	-0.036(0.03)	-0.005(0.03)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	—	0.099(0.03) ***	0.073(0.05)	0.128(0.06) **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	—	-0.098(0.04) **	-0.069(0.05)	-0.165(0.06) ***
收入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0.01(0.03)	0.012(0.04)	—	0.007(0.04)	0.016(0.04)
总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0.023(0.04)	-0.002(0.04)	-0.05(0.05)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	—	-0.04(0.03)	-0.033(0.04)	-0.044(0.04)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	—	-0.28(0.1) ***	-0.286(0.1) ***	-0.225(0.09) **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	—	0.034(0.03)	0.021(0.03)	0.055(0.04)
Breusch Pagan 检验	2.72 *	2.97 *	2.97 *	3.26 *	3.27 *	3.27 *
Hausman 检验	34.62 ***	32.85 ***	32.85 ***	51.45 ***	31.0 ***	31.0 ***
LBI 检验( )	—	—	1.46(0.286)	—	—	1.55(0.277)
有效样本数	812	812	783	812	812	783
F 值	9.44 ***	9.17 ***	9.18 ***	10.7 ***	9.0 ***	9.1 ***

注: \*表示在10%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在1%的置信度上显著。( )为残差项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其他小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各模型的 Breusch Pagan 拉格朗日乘数和 Hausman 设定检验结果也表明,我们应该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当然,也有研究指出,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更多地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固定效应模型旨在解决主体异质性问题,而随机效应模型主要从方差分析的视角区分组内、组间不同的变异程度——而非设定检验(高梦滔、姚洋)。为此,我们也尝试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估算模型(1)。从估算结果来看,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总体上与我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从估算的各省可变速矩项来看,西部地区普遍为负值,意味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相对较差。

从模型 1a 和 1b 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在引入政府间财政收入责任安排变量后,总支出责任安排及其时间和地区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统计显著性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意味着单纯考虑收支责任安排的某一方面很可能会割裂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从而导致估算偏差。当进一步校正了序列相关性后,估算结果同样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意味着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较为长久的影响。依据模型 1c 的估算结果可知,总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责任安排不尽合理,地方政府总体上承担了过多的支出事务。具体到不同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东部省份的支出责任安排较全国而言较为合理一些,体现在总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值但绝对值较小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总体上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体现在总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收入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较为模糊,体现在模型 1c 和 2c 中收入责任安排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且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也不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

就各类支出项目责任安排而言,由模型 2c 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其中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的促进力度更大且具有很好的统计显著性,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则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性支出特别是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较为合理,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则不尽合理,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性支出事务偏重。具体到不同地区,情况同样有所不同,东部省份的经济性、维持性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较全国而言合理性相对较差,体现在经济性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其中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明显偏快,因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社会性支出的适当集权则明显改善了过去责任安排不合理的状况,因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 四、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经济增长效应：动态效应估计

上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不同省份间存在的异质性问题,但该模型将所有解释变量均视为严格外生变量,可是,现实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取决于当前因素还与过去因素有关。这意味着模型(1)可能存在着动态数据结构引发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性(Arellano and Bond, 1991; Arellano and Bover, 1995; Blundell and Bond, 1998; Bond, 2002)。尽管我们也进行了时序意义上的 AR(1)校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高梦滔、姚洋, 2005)。为此,本节进一步利用动态效应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 (一)模型设定

我们构建如下形式的动态效应面板模型：

$$Gy_{it} = \sum_{j=1}^M \beta_j Gy_{it-j} + Z_{it} + W_{it} + \mu_i + \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Gy_{it-j}$  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滞后项,  $M$  为最大滞后阶数。  $Z_{it}$  为外生解释变量(满足  $\forall t, E(Z_{it} | \epsilon_{it}) = 0$ ),  $W_{it}$  包括前定解释变量(满足  $s < t$  时,  $E(Z_{it} | \epsilon_{is}) = 0$ ,  $s = t$  时,  $E(Z_{it} | \epsilon_{is}) = 0$ )和内生解释变量(满足  $E(Z_{it} | \epsilon_{it}) = 0, \forall t$ )。  $\mu_i$  为个体效应,  $\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  $E(\mu_i) = E(\epsilon_{it}) = 0, E(\mu_i | \epsilon_{it}) = 0, E(\epsilon_{it} | \epsilon_{is}) = 0 (\forall i, t, s, t > s), E(\mu_i | \epsilon_{is}) = 0$ 。

由于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而模型(2)的 OLS 回归会产生向上的估算偏差,而基于去均值变换的组内估算则会产生向下偏差(Bond, 2002; Roodman, 2006)。Holtz Eakin, Newey and Rosen (1988)与

Arellano and Bond (1991) 通过一阶差分变换消除个体效应, 并利用前定和内生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通过 GMM 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因此这种方法也称为差分 GMM。可是, 差分 GMM 也有一个明显缺陷, 即前定和内生解释变量如果具有显著的单位根特性, 那么, 基于这些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构造的工具变量会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和有限样本偏差问题 (Arellano and Bover, 1995; Blundell and Bond, 1998; Bond, 2002)。为此, Arellano and Bover (1995) 以及 Blundell and Bond (1998) 提出了系统 GMM 即在一阶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引入原始水平方程, 构成一个方程系统, 并将水平变量作为其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弱工具变量问题, 提高了估算效率。

(二) 估算结果

具体估算模型 (2) 时, 我们首先利用面板数据的 IPS 单位根检验 (Im, Pesaran and Shin, 2003) 考察各变量的时序特性。表 3 的检验结果表明, 我们无法拒绝劳动力变量、经济开放度、总支出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变量为 I(1) 序列的假设, 因此为了避免差分 GMM 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我们运用系统 GMM 估算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2)。

表 3 主要经济变量的 IPS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劳动力	经济开放度	总支出责任安排	收入责任安排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
$\bar{t}$ 统计量 (P 值)	-0.94 (0.99)	0.2 (1.0)	-1.59 (0.23)	-1.77 (0.04)	-1.14 (0.97)

此外, 我们还需要确定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最大滞后阶数以及核心解释变量——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变量  $Ds_{it}$  的性质。通过比较不同滞后阶数估算结果的 Arellano-Bond 2 阶残差自相关检验, 我们最终确定包含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2。 $Ds_{it}$  的具体性质尚不明确: 如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在处理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划分时, 完全是出于某些特定目的而与地区经济增长无关, 那么我们可以将  $Ds_{it}$  视为严格外生变量; 反之, 则需要将  $Ds_{it}$  设定为内生变量或前定变量。由于已有研究对此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结论, 因此我们考虑不同的假定情况。具体而言, 在模型 3a 和 4a 中, 我们将所有解释变量均设定为外生变量, 在模型 3b 和 4b 中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劳动力变量、经济开放度和财政收入比率设为前定变量, 而在模型 3c 和 4c 中将上述解释变量均设为内生变量。对于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时间和地区哑变量而言, 我们始终设定为严格的外生变量。表 4 给出各模型的估算和检验结果。

表 4 中 Arellano-Bond AR (1) 和 AR (2) 检验表明, 各模型残差序列均存在显著的 1 阶自相关但不存在 2 阶自相关, 意味着各模型设定总体上是可取的。进一步, 由整个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Hansen 检验以及 GMM 类和 IV 类工具变量子集有效性的 Difference-in-Hansen 检验结果可知, 除了模型 3b 的 IV 类工具变量以外, 各模型工具变量的构造总体上是有效的。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相对于样本量而言, 我们构造的工具变量数目较多, 这会造成自由度的较大损失, 从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Hansen 检验结果, 使之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内生性问题会导致 OLS 估算产生向上偏差, 而组内估算会产生向下偏差, 这意味着模型 (2) 中参数的真实值应该介于组内和 OLS 估算之间 (Bond, 2002; Roodman, 2006)。以此为标准, 可以看出模型 3a 和 4a 的估算结果总体

关于 OLS 估算、组内估算、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这些方法在估算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详细比较分析, 请参见 Bond (2002) 和 Roodman (2006)。

表 4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经济影响的动态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 GMM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总支出责任安排的动态效应面板模型			支出项目责任安排的动态效应面板模型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3c	模型 4a	模型 4b	模型 4c
常数项	-0.162(0.04)***	-0.213(0.04)***	-0.215(0.04)***	-0.172(0.07)***	-0.186(0.06)***	-0.185(0.06)***
L1. 人均产出增长率	0.035(0.04)	-0.049(0.05)	-0.048(0.05)	0.035(0.04)	-0.064(0.05)	-0.064(0.05)
L2. 人均产出增长率	-0.238(0.04)***	-0.33(0.03)***	-0.329(0.03)***	-0.207(0.04)***	-0.323(0.03)***	-0.323(0.03)***
经济发展水平	6.926(0.57)***	9.238(0.48)***	9.219(0.48)***	6.117(0.64)***	9.161(0.57)***	9.164(0.57)***
L1. 经济发展水平	-6.805(0.57)***	-9.117(0.48)***	-9.096(0.48)***	-5.958(0.63)***	-9.037(0.57)***	-9.04(0.57)***
物质资本投资率	0.466(0.04)***	0.349(0.03)***	0.348(0.03)***	0.458(0.04)***	0.323(0.03)***	0.323(0.03)***
L1. 物质资本投资比率	-0.445(0.05)***	-0.289(0.03)***	-0.289(0.03)***	-0.464(0.05)***	-0.294(0.03)***	-0.294(0.03)***
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0.389(0.34)	-0.388(0.21)*	-0.393(0.21)*	-0.261(0.4)	-0.316(0.24)	-0.314(0.24)
L1. 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0.341(0.33)	0.394(0.19)**	0.399(0.19)***	0.169(0.38)	0.315(0.22)	0.314(0.22)
劳动力变量	0.049(0.04)	0.053(0.03)*	0.051(0.03)	0.088(0.04)**	0.065(0.03)**	0.066(0.03)**
L1. 劳动力变量	-0.087(0.04)**	-0.056(0.04)	-0.054(0.04)	-0.116(0.05)***	-0.053(0.04)	-0.055(0.04)
经济开放度	0.034(0.02)*	0.051(0.02)***	0.05(0.02)***	0.024(0.02)	0.046(0.02)**	0.046(0.02)***
L1. 经济开放度	-0.017(0.02)	-0.034(0.02)*	-0.033(0.02)*	-0.002(0.03)	-0.03(0.02)	-0.03(0.02)
财政收入比率	-0.672(0.16)***	-0.427(0.08)***	-0.443(0.09)***	-0.742(0.19)***	-0.465(0.09)***	-0.468(0.09)***
L1. 财政收入比率	0.541(0.15)***	0.303(0.07)***	0.317(0.08)***	0.595(0.18)***	0.322(0.08)***	0.325(0.07)***
收入责任安排	-0.002(0.03)	0.017(0.02)	0.016(0.02)	-0.016(0.03)	-0.014(0.02)	-0.014(0.02)
总支出责任安排	-0.031(0.02)*	-0.047(0.02)***	-0.047(0.02)***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	—	—	—	0.008(0.02)	0.016(0.02)	0.017(0.02)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	—	—	—	-0.117(0.03)***	-0.08(0.02)***	-0.08(0.02)***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	—	—	—	0.061(0.03)***	0.036(0.03)	0.036(0.03)
收入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0.014(0.03)	-0.016(0.02)	-0.014(0.03)	0.047(0.04)	0.018(0.03)	0.019(0.03)
总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0.013(0.03)	0.008(0.02)	0.006(0.02)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	—	-0.005(0.02)	-0.015(0.02)	-0.015(0.02)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	—	0.025(0.04)	0.024(0.03)	0.023(0.03)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时间哑变量	—	—	—	-0.069(0.04)	-0.043(0.04)	-0.043(0.04)
收入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0.018(0.02)	0.012(0.02)	0.013(0.02)	-0.0006(0.02)	0.01(0.02)	0.01(0.02)
总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0.016(0.02)	-0.012(0.01)	-0.013(0.02)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	—	-0.025(0.02)	-0.008(0.02)	-0.008(0.02)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	—	-0.013(0.01)	-0.017(0.01)	-0.017(0.01)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地区哑变量	—	—	—	0.034(0.02)*	0.018(0.02)	0.018(0.02)
ArellanoBondAR (1) 检验	-4.21***	-3.85***	-3.87***	-3.81***	-3.77***	-3.77***
ArellanoBondAR (2) 检验	0.21	1.16	1.15	0.07	1.01	1.0
Hansen过度识别检验	10.12	61.15	33.4	5.23	11.3	11.23
Diffinr HansenGMM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Diffinr HansenIV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6.68	38.9***	4.5	4.39	-0.67	-1.44
有效样本数	754	754	754	754	754	754
Wald值	2519.7***	4251.5***	4863.3***	6715.6***	10705.2***	10817.8***

注：\*表示在 10% 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在 5% 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在 1% 的置信度上显著，小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L1 和 L2 分别为 1 阶和 2 阶滞后算子，Diffinr HansenGMMStyle 检验为 GMMStyle 工具变量子集包括内生变量和前定变量的有效性检验，Diffinr HansenIVStyle 检验为 IVStyle 工具变量子集即外生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上相对较差,意味着我们并不能将所有解释变量都视为严格的外生变量。

依据模型 3c 以及 4b 和 4c 可知,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结果相当稳健,尽管与上文固定效应模型的估算结果相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基本结论总体上保持一致:(1)总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较小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则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同样不具有统计显著性。(2)收入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旧是不明晰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跨时和跨地区差异也并不显著。(3)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些影响都具有较为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经济性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东部省份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则具有促进作用,但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则具有促进作用,但这些影响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五、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经济增长效应:阈值效应估计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这意味着,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很可能并非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为此,本节进一步利用 Hansen(1999)提出的阈值效应面板模型,考察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 (一)模型设定

我们考虑如下形式的单阈值面板数据模型:

$$Gy_{it} = X_{it} + \beta_1 Ds_{it} I(Thre_{it} < \tau) + \beta_2 Ds_{it} I(Thre_{it} > \tau) + \mu_i + \gamma_t + \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X_{it}$  包括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滞后 1 期和 2 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劳动力变量、经济开放度和财政收入比率等变量的当期和滞后 1 期以捕捉动态数据结构特性。 $I(\cdot)$  为指标函数,  $Thre_{it}$  为阈值变量,我们分别考虑人均产出自然对数和收入责任安排变量,以捕捉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权划分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考虑以总支出责任和各支出项目责任安排变量作为阈值变量,以捕捉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tau$  为单阈值。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单阈值面板模型(3)拓展到如下形式的双阈值面板模型:

$$Gy_{it} = X_{it} + \beta_1 Ds_{it} I(Thre_{it} < \tau_1) + \beta_2 Ds_{it} I(\tau_1 < Thre_{it} < \tau_2) + \beta_3 Ds_{it} I(Thre_{it} > \tau_2) + \mu_i + \gamma_t + \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tau_1$  和  $\tau_2$  为双阈值。

#### (二)估算结果

限于篇幅,我们略去了模型(2)的 OLS 和组内估算结果。由于我们的样本容量相对较少,为了避免小样本偏差,我们采取了一步系统 GMM 估算,并构造了两个工具变量子集:一是 GMN 类工具变量,包括一阶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即前定和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z_{it-s}(t=3, \dots, T; 2 \leq s \leq t-1)$  以及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即前定和内生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  $z_{it-1}(t=3, \dots, T)$  (Arellano and Bond, 1991; Blundell and Bond, 1998); 二是 IV 类工具变量,包括基于外生解释变量构造的工具变量。由于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是非一致的,因此我们采用 Hansen 检验和 Difference In Hansen 检验(即利用不同假设下 Hansen 检验统计量的差)进行整个工具变量集和两个工具变量子集的有效性检验。此外,我们还尝试利用系统 GMM 的 Collapse 技术来减少 GMN 类工具变量数量以克服工具变量较多带来自由度损失问题,以及利用带 Windmeijer(2000) 有限样本校正的两步系统 GMM 进行估算,但得到的结果均不理想。关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算的详细介绍,请参阅 Roodman(2006)。

Zhang and Zou(1998) 以及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7) 分别从理论上指出,财政分权以及资本性支出分权都存在着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水平,即它们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Hansen(1999) 详细介绍了单阈值以及多阈值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和估算过程。

具体估算模型(3)或(4)时,我们首先根据不同的阈值变量,利用似然比检验是否存在着阈值效应以及存在着几个阈值,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给出具有阈值效应各模型的估算结果。具体检验和估算结果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当收入责任、经济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变量作为阈值变量时,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具有显著的阈值效应。因此,我们下面简要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变量作为阈值变量时,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表5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阈值效应的检验和估算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阈值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收入责任安排	总支出责任安排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
收入责任安排	原假设1	9.58	8.37	12.43	11.79	16.27***	8.87
	原假设2	—	—	—	—	5.33	—
	阈值	—	—	—	—	0.92(0.921 .03)	—
	1	—	—	—	—	0.006(0.02)	—
	2	—	—	—	—	-0.022(0.02)	—
总支出责任安排	原假设1	18.15***	6.78	13.33*	9.88	14.75**	9.52
	原假设2	14.2*	—	4.93	—	3.94	—
	原假设3	13.6	—	—	—	—	—
	阈值1	6.28(6.186 .39)	—	0.77(0.750 .84)	—	0.92(0.9161 .03)	—
	阈值2	7.14(5.667 .27)	—	—	—	—	—
	1	-0.094(0.04)**	—	-0.129(0.04)***	—	-0.106(0.04)***	—
	2	-0.139(0.04)***	—	-0.151(0.04)***	—	-0.128(0.04)***	—
3	-0.165(0.04)***	—	—	—	—	—	
经济性支出责任安排	原假设1	24.6**	10.88	11.68	12.53	10.15	9.47
	原假设2	11.2	—	—	—	—	—
	阈值	6.33(6.186 .43)	—	—	—	—	—
	1	0.051(0.02)**	—	—	—	—	—
	2	-0.011(0.02)	—	—	—	—	—
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	原假设1	21.7**	7.68	13.6	10.14	10.95	19.95
	原假设2	11.03	—	—	—	—	—
	阈值	6.28(6.26 .37)	—	—	—	—	—
	1	-0.057(0.04)	—	—	—	—	—
	2	-0.082(0.04)**	—	—	—	—	—
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	原假设1	22.7*	9.64	19.82*	12.1	15.7*	19.15
	原假设2	11.84	—	12.86	—	3.85	—
	阈值	6.28(6.26 .39)	—	0.77(0.750 .78)	—	0.92(0.9161 .03)	—
	1	0.022(0.03)	—	0.046(0.03)	—	0.051(0.03)*	—
	2	-0.006(0.03)	—	0.018(0.03)	—	0.028(0.03)	—

注:原假设1和2对应的的各行数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原假设1为不存在阈值效应,原假设2为不存在两个阈值,原假设3为不存在三个阈值。如果拒绝原假设1,则需要进一步以双阈值面板模型的估算结果为基础对原假设2进行检验,依次类推,似然比检验显著性P值是通过100次bootstrap得到的。阈值一行小括号中的数字为95%的置信区间。当只存在一个阈值点时,1为小于阈值时的回归系数,2为大于阈值时的回归系数;当存在着两个阈值点时,1为小于阈值1时的回归系数,2为介于阈值1和阈值2间的回归系数,3为大于阈值2时的回归系数。\*表示在10%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在1%的置信度上显著。限于篇幅,略去了其他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

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阈值变量时,总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阈值效应,且均为抑制作用;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的力度明显加大,表现在与 6.28 和 7.14 这两个阈值相对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4、-0.139 和 -0.165 且都具有很好的统计显著性。各支出项目责任安排也都具有显著的单阈值效应,其中对于经济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对于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具体来说,对于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而言,阈值分别为 6.33、6.28 和 6.28,对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51 和 -0.011、-0.057 和 -0.082 以及 0.022 和 -0.005,但显著性都相对较差。

当总支出责任安排变量作为阈值变量时,只有总支出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阈值效应,阈值均为 0.77。总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总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的力度明显加大,表现为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0.129 和 -0.151,且都具有很好的统计显著性;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随着总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促进作用的力度明显减弱,表现为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0.046 和 0.018,但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当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变量作为阈值变量时,收入责任、总支出责任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均具有显著的阈值效应,阈值均为 0.92。从它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6 和 -0.022、-0.106 和 -0.128 以及 0.051 和 0.028)及其统计显著性来看,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不确定;总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作用的力度随着社会性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加大;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促进作用的力度和显著性随着社会性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

##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动态效应和阈值效应面板模型全面考察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特别是着重考察了不同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的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变革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改革的方向。

表 6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责任安排	模型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动态效应面板模型		阈值效应面板模型	
		1978—2005 年间	1994 以来	1978—2005 年间	1994 以来	1978—2005 年间	
总支出		不利***	有利	不利***	有利	不利***	
其中:经济性支出		有利	不利	有利	不利	有利** 不利	
社会性支出		不利	有利**	不利***	有利	不利 不利**	
维持性支出		有利***	不利***	有利	不利	有利 不利、有利 有利、 有利* 有利	
总收入		模糊	不利	模糊	模糊	模糊	

注: \*表示在 10% 的置信度上显著, \*\*表示在 5% 的置信度上显著, \*\*\*表示在 1% 的置信度上显著。表示当阈值变量超过阈值后,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变化。其中,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给出的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阈值变量的情况,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给出的是以经济发展水平、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为阈值变量的情况。

我们的研究表明(表 6 概括了本文的研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总体上还有待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承担的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事务过重,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收入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模糊,而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则相对比较合理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些影响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阈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从表6可以看出，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这些结论对于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在我国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理顺财政关系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收支责任的总体安排。第二，从是否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收入责任安排如何并无大碍，也就是说，是地方政府收入责任（收入比重）大些还是中央政府收入责任（收入比重）大些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支出责任如何安排。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要依据不同公共支出事务的具体特点来合理划分各支出项目的责任。具体来说，应将行政管理等维持性支出责任适当下放给地方政府，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基本建设等经济性支出以及科学、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性支出事务过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以更好地优化各级政府的职能配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是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视角揭示了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存在的问题，而基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探究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将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题。此外，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关于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阈值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而从实证角度澄清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作用，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高梦滔、姚洋,2005:《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 郭庆旺、赵志耘,2006:《公共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 郭庆旺、贾俊雪,2006:《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第5期。
- 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2期。
-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1期。
- 张晏、龚六堂,2005:《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1期。
-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和合作》,《经济研究》第6期。
-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周业安,2003:《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 朱恒鹏,2004:《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制》,《世界经济》第12期。
- Arellano,M.and S.Bond,1991,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 Arellano,M.and O. Bover.,1995,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68.
- Baltagi,B.and Wu,P.X.,1991, "Unequally Spaced Panel Data Regressions with AR(1) Disturbance", *Econometric Theory* 15.
- Blundell,R.and S.Bond.,1998,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87.
- Bond,S.,2002,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A Guide to Micro Data Methods and Practice", Working Paper 09/02,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London.
- DeLaFuente,A.,2003, "Convergence Equations and Income Dynamics: The Source of OECD Convergence, 1970—1995", *Economica* 70.

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至少与目前许多人认为的“现行收入责任安排下地方政府收入比重相对较低，因而应增加地方政府自主收入”的观点不一致。其实，就是在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出现“集权”趋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大大高于多数国家，比单一制国家平均水平高出147%，甚至比联邦制国家平均水平还高出48%（郭庆旺、赵志耘，2006，第355页）。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其实是一个财政分权程度很高的国家。

- Hansen, B.E.,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93.
- Holtz Eakin, D., W. Newey and H.S. Rosen, 1988, "Estimat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anel Data", *Econometrica* 56.
- Im, K., M.H. Pesaran, and Y. Shin, 2003,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15.
- Lin, Justin Yifu and Liu, Zhiqiang, 200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 Mankiw, N.G., D. Romer, and D.N. Weil,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 Qian, Yingyi and B.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 Qian, Yingyi and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 Roodman, D., 2006,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03.
- Zhang, Tao and Zou, Heng-f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 The Effect of Intergovernmental Assignments of Publ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ia Junxue and Guo Qingwang

(China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assignments of publ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erspective.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1) total and soci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s have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on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and maintenanc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total revenue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effects are implicit,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intergovernmental division of publ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is not better; (2) the intergovernmental assignments of publ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have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mainly depend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s well as total and soci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3) the position of total and soci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s has become more better since 1994, while the position of economic and maintenance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s has become more unreasonable.

**Key Words:** Intergovernmental Assignments of Public Revenue Responsibility; Intergovernmental Assignmen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H730, O110

(责任编辑:唐寿宁)(校对:晓鸥)